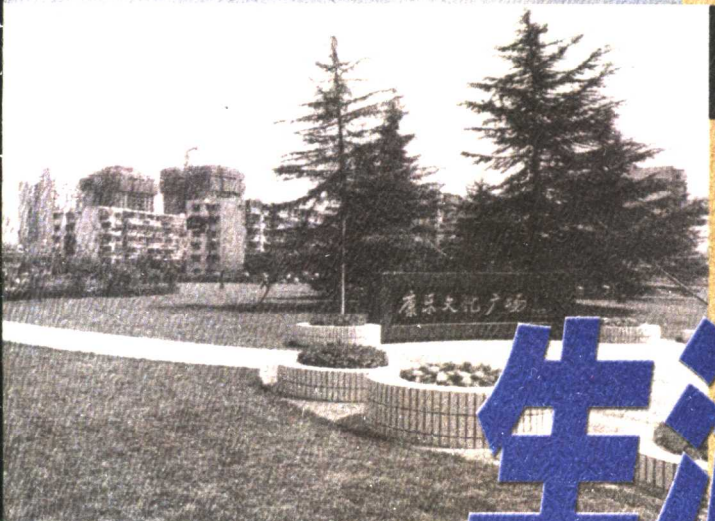


徐中振 李友梅 等著



生活家园 与社会共同体

——“康乐工程”与上海社区实践模式个案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SHENGLUO JIANYUAN YU SHEHUI GONGTONGTI

0.3

0

生活家园与社会共同体

——“康乐工程”与上海社区实践模式个案研究

徐中振 李友梅等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家园与社会共同体：“康乐工程”与上海社区实践模式个案研究/徐中振等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12

ISBN 7-81058-634-3

I. 生... II. 徐... III. 社区-城市建设-上海市-文集 IV. D66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993 号

生活家园与社会共同体

徐中振 李友梅 等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e-mail: adcbcsctiz.net 发行热线 56331131)

出版人：李顺祺

*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125 字数 430 00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500

ISBN 7-81058-634-3/C·032 定价：40.00 元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努力营造服务功能完善、居住环境舒适、治安秩序良好、管理手段先进、人际关系和谐、自治参与广泛的新型社区,这是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最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中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社区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积极探索解决社区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开创上海社区建设的新局面。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家园,也是上海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加强社区建设有利于培育社会公共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自觉认同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是社会和谐、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加强社区建设有利于创新和完善城市管理和治理新机制,随着政府转变职能进程的不断深化,迫切需要培育和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形成政府行政管理、社会综合治理和居民自治管理的新机制。加强社区建设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通过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培养平等交流、协商合作、自我管理的秩序和民主作风,使居民群众在上海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全体性作用。加强社区建设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不仅能解决居民群众日常物质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提供各类服务项目,而且更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样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的要求。自1996年以来,上海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从上海推进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

法治化的进程来看,从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来看,对上海社区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推进社区实践的探索创新,不断深化对社区发展深层次问题的理论认识。例如:在社区设施建设和管理方面,如何更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类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建设;如何拓展社区设施的社会化管理方式等等。在社区管理体制方面,如何进一步推动管理中心下移,理顺条块关系,使行政管理真正落实到基层,发挥最优化配置的效能;如何发挥社区中介组织、市场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丰富社区的服务功能,加强和完善社区整合功能,奠定社会稳定的牢固基础。在居民委员会民主自治建设方面,如何切实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功能。今年是上海市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年,要深入探讨和切实形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工作机制和运行方式,使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到基层社会的各项事务和发展进程中来,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区建设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方面,如何使社区工作提升专业化水平,发挥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社区安全、社区教育、社区调解和社区矫治工作领域中的作用;如何培养一支稳定的社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队伍,确立社区社会工作的职业岗位,探索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行政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的合作协调关系等等。我们还要在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深化社区党建工作方面,在社区结构功能、组织发育、运行体制和机制等理论研究方面作出新的探索。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在上海新一轮发展中,社区建设的深化和发展,将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领域,上海广大社区工作者多年来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实践推动中作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和创新,这些宝贵经验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本书的理论工作者们坚持数年深入社区开展调查研究,走家串户,从居民群众和社区生活中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且与基层社区实际工作者们紧密结合,共同分析社区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交流探讨发展社区的思路和方法,这样既有利于理论研究不脱离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理论,又有利于提高社区工作干部的理论修养,促进社区建设实践不断深化发展。希望广大基层社区工作者与理论界专家学者更紧密地携手合作,扎扎实实地推进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努力为上海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2003年10月25日

目录

Contents

序 / 1

- 1 “康乐工程”——回归社区生活世界 / 1
 - 1.1 走近社区生活场景 / 2
 - 1.2 从市场再造向社会重构演进 / 6
 - 1.3 从条状体制向块状结构转型 / 10
 - 1.4 从行政主导向社区本位回归 / 13
 - 1.5 从“街居制”向“三层多元结构”拓展 / 25

- 2 社群领袖——探路人的足迹 / 30
 - 2.1 从划桨向掌舵的转变 / 31
 - 2.2 让居民中的“领头羊”冒出来 / 37
 - 2.3 康健社区“四大明星”的故事 / 40
 - 2.4 让更多的人动起来 / 56
 - 2.5 “白搭车”与全能政府 / 60
 - 2.6 原上草与盆中花 / 65
 - 2.7 探索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 / 71

- 3 行政推动——政策与实践的演进 / 76
 - 3.1 认识和定位 / 77
 - 3.2 组织发展与形态建设 / 89
 - 3.3 政策推进和实践经验 / 98
 - 3.4 挑战和再发展 / 112
 - 3.5 附录 “康乐工程”“五个一”的组织网络 / 117

- 4 组织互动——行动者的逻辑/ 119
 - 4.1 社区组织概述 / 121
 - 4.2 社区组织互动的前提与基础 / 136
 - 4.3 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权力与秩序 / 146
 - 4.4 讨论·本研究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 / 156

- 5 价值关怀——社区理念的浮现/ 161
 - 5.1 社区 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 / 162
 - 5.2 重温社区的类型学理论 美好的回忆 / 166
 - 5.3 社群主义 新的憧憬 / 174
 - 5.4 社区发展 实践的综合 / 179
 - 5.5 回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 183

- 6 “康乐工程”与上海社区实践的深化/ 188
 - 6.1 社区实践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 188
 - 6.2 “康乐工程”与社区实践模式的四大探索与创新 / 192

- 附录 关于康健社区实践发展的调查报告和参考资料/ 197
 - 一、上海市康健街道社区发展调查报告 / 197
 - 二、上海市康健街道“社区快乐指标”专题调查报告 / 231
 - 三、上海市康健街道“千人访万家”活动专题调查报告 / 240
 - 四、以“康乐工程”为实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型社区 / 247
 - 五、探索实施“康乐工程” 推进跨世纪社区发展 / 252
 - 六、“康乐工程”的实践与思考 / 260
 - 七、积极拓展社区党建工作的街坊平台 / 266
 - 八、社区党建大有可为 / 271
 - 九、健康、快乐的“康乐工程” / 273
 - 十、这里的共产党员“全天候” / 278

- 后 记/ 281

1

“康乐工程”

——回归社区生活世界

认识和分析当代中国社区建设的发展状况,似乎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从判断的参照依据来看,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而把社区建设分别作为社会整合方案、政治发展方案以及共同体重建方案等,国际学术界也形成了相应的多样化的理论诠释。从评价的实践主体来看,社区的结构、功能、组织等仍然处在初始的分化过程之中,各种不同的对象及其目标都汇聚在一个形式统一的过程之中。这种情形十分类似于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双轨制运行,而市场经济制度则是作为逻辑发展的最终结果在此后才逐渐显示出来。相比较而言,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之后,当前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认识已经变得比较具体实在,它具有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要素市场,具有形成法人治理结构的公司组织,具有产权归属明晰的投资主体等,并且由于中国加入WTO组织而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体系,市场经济领域不仅在国内具有独立的结构性地位,而且在功能和运行方式等方面具有外部的国际化认同的标识和依据。

如何解读当代中国的社区难题,这里提出以下的分析思路或认知框架:① 聚焦社区个案经验和实证分析。任何一场普遍发生和全面推进的社会变迁,都必然在其具体丰富的展开过程中才能实现,而我们只能通过对某个社区的定量定性考察,才能研判和揭示它的真实意义。② 深入社区日常生活领域。走近社区生活场景,才能发现社区的依赖人群、对社区的归属目标、参与社区的活动方式等等。③ 梳理社区与市场体制的互动关系。作为经济关系的住宅产权等正在成为社区依赖、认同的重要基础,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经济增长、市场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社区领域生成发育的重要理由和依据。④ 辨析社区与政府的互补作用。

政府推动改革促进了社区发育,而社区发展又有利于突破传统的行政一体化格局。

⑤ 把握社区体制变迁的发展趋势。既要看到传统“街一居”制形成的路径依赖,又要考察体制发展的选择空间和变动要素。

我们选择上海康健地区作为社区个案研究对象,考察“康乐工程”作为社区发展的具体推进方式和展开过程,就是旨在描述和揭示社区这个正在发生发育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性领域,并把它看作当代中国总体社会转型的具体产物和重要缩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社区考核目标(如文明社区创建、安全小区创建)以及运动式推进方式等不同,“康乐工程”以独特的话语系统推出了自己的目标主题:“使居民身心更健康,让社区生活更快乐。”正是循着这样一个以社区发展为本位、以实现居民需求为目标的基本主旨,才创造性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框架:①以“五个让”的工作目标切实完善社区功能——让陌生的人熟悉起来,让劳累的人轻松起来,让疏远的人亲近起来,让困难的人得到关爱,让奉献的人受到尊敬。②以“五个一”的工作机制构建社区参与的制度框架——一个各方广泛参与的组织网络,一批符合群众需求的阵地设施,一支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骨干队伍,一种陶冶道德情操的环境氛围,一组富有时代气息的活动主题。③以“五个乐”的行动项目满足社区居民全面发展的需求——乐在安居,乐在文化,乐在参与,乐在互助,乐在爱心。我们应该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正是在上述基本主旨、工作思路和实施框架中,深刻地反映和显露出上海社区建设真正回归人们日常生活世界和回归民间社会发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演变趋势。

1.1

走近社区生活场景

在把康健社区作为经验描述的对象之前,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提出分析中国社区发展的三个假定。假定之一,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结构性分化,单位体制的消解促进了社会组织功能的分化。这些进程必然导致社会事务大量涌现、重新分解并逐渐回归社会。假定之二,在政府主导和推进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许多政府行政职能无法涵盖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出现许多行政化方式不适合处置的公共事务和民间需求,这些变化奠定了民间社会自治发展的客观基础。假定之三,伴随着人们与职业谋生组织依赖关系的简化和弱化,大量“单位人”、“经济人”脱变为孤立的“自然人”角色,他们需要重建新的社会联系和关系,通过社会参与和互动,逐步获得“社会人”的特质,这些群体人数不断增加,构成了社区领域

的基本成员。上述假定不仅是我们能够把康健地区、“康健街道”(行政区划)作为社区来考察分析的理论前提,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康健社区发展的经验描述和实证分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切实地证明这些假定,并且具体说明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社区自身发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走近康健社区,我们真正关注和感兴趣的是走进它真实的社会生活领域,深入它真实的社区生活场景。

康健社区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西南部,地处上海的西南区域,毗邻上海师范大学。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2000年末,街道总面积为2.48平方公里,有户籍居民51115人,常住人口60473人。与上海大量的老城区状况相比,这是一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兴建的比较单纯的居民住宅区,有配合中心城区市政建设动迁建造的新公房,有为数不少的市级机关及企业集团系统自建的公寓楼,还有一些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最先建造的高档别墅群。有意思的是,这些住宅分别命名为健安坊、康宁坊、康强坊等小区,长虹坊、长顺坊、寿昌坊、寿祥坊等小区(分别以“健”、“康”、“长”、“寿”为名),以及紫薇园、玉兰园、月季园、杜鹃园等小区,形成了独具街坊邻里氛围和人文社群区位的特有布局,这在上海大都市中已极少见到了。据2000年调查显示,高达95%以上的居民住房都是单独成套的居室,16.5%为商品房,57.2%为售后产权房,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户比例已达73.7%。被调查者平均月收入800~1200元的占18.1%、1200~2000元的占16.1%、2000~3000元的占6.4%、3000元以上的占1.8%,反映出社区成员主要以中等收入的群体为主。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状况看,大专、大学及以上者占27.7%,高中占34.5%,反映了社区居民文化素质较高。

应该说,康健地区在居住的性质和格局、居民的职业类型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比较能够反映和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变迁发展的趋向,在社区认同的产权基础、社区类型分化的成熟状态、社区参与的文化素质等方面都具有较好的自然、人文和社会性的基础。

自1995年10月起,康健地区的社区建设经验逐步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1995年8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了“社区发展与现代文明”课题组^①,研究社区发展在社会变迁和重组中的意义、社区在各类社会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地位和功能,探讨中国特色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等。在“完善自助与互助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一专题中,我们发现并调查了康健街道“抓好物业管理,促进社区管理发展”的经验。他们针对原有行政性、福利性住房管理体制作出改革,于1995年初在上海率先选举成立康乐小区业主委员会,并于1995年7月组建了全市第一

^① 研究成果见徐中振等主编:《社区发展与现代文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个由康健房管所转制而成的“兴康物业公司”，实行企业化运作。他们提出了“以服务为宗旨，以经营为手段，以效益为目的”的管理理念，注重“体现产权人的意志，实现产权人的利益”，逐步理顺和形成了由“政府的行政管理，业主的自治管理，物业公司的专业管理”构成的新型管理体制。在今天来看，康健地区的社区建设能够在1995年就注重对传统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和方式作出突破性的改革探索，并且敏锐而深刻地把维护居民在社区的重大房屋产权这一经济利益与加强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结合起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同时也为社区发展、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98年下半年起，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组织了上海社区建设八大专题系列研究^①，其中邀请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在康健地区作了“社区管理与物业运作”专题调研^②。考察主题和重点是居民区这一层面基层社会的主要组织、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形成的治理结构，具体分析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三驾马车”的组织分化与合作关系以及居民区党支部发挥的协调整合作用。这次调查搜集了反映社区运行真实情况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分别对居民、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的四个问卷调查，对长虹坊等四个小区作了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组织关系的四个专题调查，对居住物业状况及管理方式开展了大量综合性访谈等等。这项实证调查和分析研究证明，社区建设的地位与作用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居住物业产权多元化的发展而日益突出，基层社区建设正在形成以物业管理为基础、以自治管理为中心的新型体制和机制。居民群众在小区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过程中，公共事务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逐渐提高，康健地区的社区实践出现了政党组织（居民区党支部）、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利益组织（业主委员会）和市场组织（物业公司）共同参与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1999年9月25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视察了康健街道康乐小区，明确提出“社区党建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就会有生命力”。康健街道党政领导成员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深受鼓舞，决心不断深化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提出新目标，建设新社区，迎接新世纪。经过酝酿协商，康健街道作为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的研究基地，共同组建了“‘康乐工程’课题组”。课题组提出了建设“康乐工程”的工作构想和基本思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社区大文化建设为主线，以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为基础，营造安居乐业的新型社区，实现“使居民身心更健康，让社区生活

① 见徐中振主编：《上海社区建设研究报告丛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② 见曹锦清、李宗克著：《社区管理与物业运作》，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更快乐”的目标。当时课题组主要成员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共识：第一，课题组的工作目标不是围绕某一项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任务，坚决摒弃突击式、运动式和形式化的工作方式，而是特别注重把握居民群众对社区建设的全面的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推进社区成员的主体性参与和社区功能性组织的发育发展，确立社区发展的牢固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第二，既要加强社区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探讨社区结构功能、运行机制、组织发育等主要理论问题，更应特别注重开展针对康健社区实践的对策分析，要从社区全面发展的理性模式和个案实验的意义上，切实推动康健社区建设的深化完善。

自2002年至今，围绕“康乐工程”的实施推进，逐渐形成了“五个让”的工作目标、“五个一”的工作机制、“五个乐”的行动项目等，康健地区的社区建设不断深化发展和丰富完善，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体现出一种新的境界。这些变化发展的成效最终切实地展现在以下生动具体、丰富深刻的社区日常生活场景之中：

(1) 培育了各类自我管理、自主活动的社区协会等组织。在我们通常熟知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或者单位组织之外，其实在社区中已经出现大量新的组织。“康乐工程”推进中注重发挥京剧爱好者协会、舞蹈协会、科普协会、各类拳操队以及业主委员会和市民巡访团等民间组织的作用，让它们成为民间参与的发动机。

(2) 涌现出一批社区活动的骨干和领袖人物。几乎在每一个活跃的社区团队中都形成一些被人们公认的核心人物，而且组织活动的积累效应正在推出一些在全社区都享有知名度和影响的重要人物，如长虹坊业主委员会主任郭林雪、康健舞蹈队队长王祖蕾等。

(3) 出现了大量丰富多彩的自我组织的社区文体活动。每天清晨和晚间，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参与自由组合的各项活动，从活动内容、时间、地点、方式到活动器材的添置等都自行协商施行。康健社区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四支百人文体队伍，即：百人健身队、百人腰鼓队、百人太极拳队和百人木兰拳队。

(4) 营造了一些具有社区功能的独特设施和项目。在康健社区不仅有较大型的康乐文化广场、社区学校等场所设施，还有遍布各居民小区的老年活动室、健身苑以及戏迷角、遛鸟角、垂钓角、园艺角等，使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方便地参与各项社区活动。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近年来还设立了心理疏导的“心理健康俱乐部”、关怀弱者的“‘康乐工程’爱心基金”（已获得各界热心人士捐赠30余万元）。

(5) 形成了超越传统单位组织关系的新型社区协调机构。如在街道和小区层面上就有各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等参与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社区党建联席会议、社区事务协商委员会等，共同参与和发展地区性、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的社区公共事务。

(6) 构筑了发挥社会化服务体系功能的街坊生活圈。“康乐工程”推进中敏锐地适应连锁超市进社区的新业态和商品房整街坊开发的新趋势、新变化,探索在街坊区域层面上配置社区文化分中心、社区医疗分中心、社区保障事务分中心等服务机构,并建立街坊事务协商会、政风行风监督站、街坊市民巡访团等组织,从而更好地整合社区资源、拓展服务功能、提升自治参与水平。

(7) 丰富了居民区群众自治参与的新机制。为了克服居民区事务由少数几位居委会成员包揽承担的弊端,“康乐工程”推进中提出,在居委会组织内组建若干个吸纳更多居民参与的专业性工作委员会,如居民区文化教育委员会、福利保障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综合治安委员会等,发动居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8) 增强了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基础和组织功能。康健社区不但在街道层面上建立了党建联席会议、社区党校等群众工作载体,而且在各居民小区建立了在职党员志愿者联络站,把具有不同专长的在职党员分别组成教育咨询、医疗咨询、法律咨询、夜间巡逻、环境绿化和文化体育等各类服务队,通过这些具体实在的为民服务活动,扩大了执政党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以上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具体介绍社区生活场景的各个方面,就是试图不从一般的社区管理概念出发,也不从政府推动的行政目标或行动口号出发,而是我们对当今中国社区建设的认识和把握回归到社区生活世界本身,回归到民间社会发育发展的真实状况之中。以这样的社区场景和视野来考量,我们便能真切地感受到正在萌发生成的社区社会事务的公共空间、正在发生和拓展的社群人际交往以及在参与和互动过程中正在奠定的社区认同和归属的根本基础。社区的发展正在成为个人、家庭与政府、国家之间新生长出来的社会领域,正在成为人们在职业生活的“经济人”之外融入社会、互助关怀的新型的参与方式。总之,康健社区的发展和“康乐工程”的推进,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场景和格局:居民群众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明显提高,政府在基层社会承担的事务和压力明显减轻,执政党基层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明显增强和巩固。

1.2

从市场再造向社会重构演进

就我们多年来对康健社区这一个案的观察和研究而言,有一个十分强烈的直观感受,即我们能够具体而实在地体验到社区生活世界的存在,人们生活在一个个

生活小区之中,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活动群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各项活动,出现了我们前面列举的若干社区生活场景。但是,我们又存在深深的疑惑,或者说不断地面临和受到来自外部以及自身提出的种种理性追问:在社区生活场景背后的意义世界是什么?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实践带来的根本进步是什么?在现实的认识中,人们往往将社区建设视为由政府推进的目标和操办的事务,主要是政府组织中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机构的局部性工作,大量的经济组织、教育文化组织与所在社区仍然处于疏离状态,广泛的职业群体尽管以巨额资产购买了住宅但仍缺乏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中的主体活动人群和依赖人群是老年人、病残人和失业人员等弱势、困难的社会边缘化群体,社区中发生的一切都仅仅是日常生活琐事,或者是一些民间草根的好人好事,与显赫的政治要务活动和经济建设活动相比,只能是边缘化社会。

让我们试着改变问题的提法,即当代中国的社区是从哪里来,然后我们才能追问它是什么,以及将向何处去。我们需要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去探寻社区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及其意义世界。在这里,我们需要对新生勃发的社区生活世界作出宏大叙述,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化转型的深刻变迁观照康健这个小小社区的寻常事实。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

在我国原有体制下,政府作为国家代表成为一切社会资源的支配者,依靠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实现对社会生活的统一管理。每个单位组织代表政府承担对个人所有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包揽其成员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形成一个个“小社会”。因此,在传统体制下,行政一体化结构挤占了所有社会领域,“单位”之外没有任何社会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渐改变了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改变了对社会事业的全面包揽,由此引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结构大分化的新格局。

首先是再造市场,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资源的多元化配置。“政企分开”使企业和市场逐步从政府行政体系中分离出来。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建立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市场要素和资源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配置,通过竞争及其带来的活力和效率,广泛提供私人消费物品和服务。

其次是在市场基础上重构社会,形成了以公共利益、公共事务为基础的社会资源的多样化配置。随着原先政府和企业组织不应承担的大量社会功能和人们日常生活大量事务逐渐回归社会,社会成员必须利用自身资源解决共同面临的事务,解决他们在提高生活质量和日常生活中多样化、个性化、情感性的各类困难和问题。据我们在康健社区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对“服务他人、奉献社会”这一社区志愿

者活动理念很赞同的占75.5%，比较赞同的占24.3%，仅有0.2%不赞同。而已经参加过邻里互助和志愿者活动的比例为：打扫公共卫生56.2%，扶贫帮困41.8%，夜间值班33.6%，环境绿化23.3%，治安巡逻19.9%，助老助残10.6%，其他还有技能性活动，如医疗保健、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

依据以上分析，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值得重视和探究的问题，即康健社区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康健社区的许多工作项目和活动内容，都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有着深刻而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市场经济发展作为相关因素和影响缘由促进了社区功能的生成和社会领域的发育。第一，企业组织蜕变为专一的经营单位，把员工的物质生活服务和精神文化需求回归社会，转移到社区；住房产权私人化进程不仅使市民在社区中形成重大的物质利益认同基础，萌生了业主委员会这样的维权自治组织，而且由于住宅价格的市场化自然选择机制，正在深刻地加速社区类型的“阶层性”分化，形成社区需求、社群交往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由此引发了城市市民一百万人下岗再就业这一结构性失业的严重压力，这回家待业的百万人群体就是由社区提供物质救助、就业培训以及不可或缺的精神关怀。几乎在此同时，上海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建设和改造的超常规发展奇迹中，经历了一百万市民的迁移安置，在告别了“单位照管”的年代后，又是社区承担了动迁矛盾协调和新的居住地一切日常生活的安排照料。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城市建设改造发展把大量的问题和矛盾跨领域地转移到社区和社区之中，可以想象，当时社会的紧张和压力都以漏斗效应汇聚社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这一切又促进了社区和社会的发育。第三，市场的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不可避免地会使一部分人暂时陷入困境，市场遵奉的功利取向和契约原则，打破了以往的温情纽带。但是我们在社区工作领域却可以看到，开展了大量对弱势人群的帮困救助，关怀老人的晚年生活，组织丰富的文化、娱乐和健身活动。这些看似日常平凡的活动内容，恰恰高扬了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的珍贵价值，维系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贯彻落实，培育着社会互助和社会公益精神。它们在情感心理、精神人格、道德伦理层面上关怀着人的全面发展，它们真正使经济增长的利益成为人们共享的生活质量，使经济发展真正实现为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这里我们似乎应该看到社区建设和社区场景背后那深刻厚重的意义世界，它承担着当代中国整体转型中艰难的社会重组和重构的功能，它努力营造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营造着人们精神和情感的归依家园。然而，当前中国的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社会发育不充分的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或者说，作为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领域的存在仍处于“隐性化”状态，这种隐性社会的现象可以提出如下的分析：

(1) 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居住着非户籍的被称为“外来流动人口”的庞大人群，

他们的生存、发展状态作为现实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意义往往被忽略了,被遮蔽了,只是隐性化地存在。这些应该被视为城市新移民、新成员的群体难以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难以融入社群的自治生活,与当地政府机构没有直接的行政性关系,与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福利保障无缘。同时,这个群体仅仅被片面化地作为“经济人”角色看待,他们在公司企业中打工谋生,他们买商品房或租房,他们的一切存在和活动似乎都被简单归结为仅仅与市场化有关。然而,这个庞大的新移民群体的真实社会存在和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以上海为例,在1300多万户籍人口之外,已形成约300~400万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了几年、十几年,安家置业,生儿育女,形成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在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等活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这几百万人口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已经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实质性领域而存在。在中国各大主要城市及其周围都存在着这类隐性化的社会流动群体。由于他们的社会特征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难以形成固定的社会关系,因而事实上处于行政社会的边缘,只能以“隐性化”的状态存在。

(2) 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交往中逐渐建立起新的初级社会关系和形成亚组织状态的各类群体,甚至出现了业主委员会这样的自治组织,它们具有反应灵敏、活动多样、成员认同程度高、组织及活动成本低等特点和优势。然而,这些群体和组织缺乏发展的制度性空间和权威资源,其组织功能和运行方式都“隐性化”了。比如,在城市社区中就大量存在着文体团队,兴趣小组,娱乐、健身俱乐部等组织形式。它们没有显性的社会结构,保持松散、自发的活动方式,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时则处于消极的被组织状态。总的来说,这类组织仍然停留在社会组织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为亚组织社会群体。

(3) 一部分社会群体因下岗失业离开了单位组织,或因年老而退出了职业生活,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被阻断,新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方式尚未形成,这部分边缘性群体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处于孤独离散的“隐性化”状态。随着单位制的弱化和消解,出现了大量被甩出单位组织的群体。原先,所在单位是他们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他们从单位生活中获得社会认同,实现社会价值。然而一旦社会关系脱离了原有单位,他们也就失去了单位所能提供的各类支持,于是正常的社会关系受到阻断,社会活动的空间大大缩小。因此,这类群体正在逐步滑向主流社会的边缘,生存方式出现“隐性”状态。这些群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面临种种困难,更无法形成群体性的社会支持力量。

(4) 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居委会等自治组织,目前通常具有行政化和科层化的特点,因此,作为现代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如利益代表、权益维护、群体整合等等,以及组织的社会性、群众性、自治

性、独立性等等基本性质和特征恰恰被“隐性化”了。由于这类组织的组织资源、权威基础都来源于并建立在与政府行政体系一体化的制度结构中,它们的组织方式、工作机制以及活动形式等都采用了行政指令性的模式,因而这类组织反而难以发挥与行政组织形成结构互补、功能协调等特殊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5) 尽管当前中国的社会领域在结构定位、功能发育、组织资源、权威基础以及活动方式等方面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认知表征,也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价值意义。但是,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层面上,人们却普遍感受到不断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或者说,社会领域作为问题领域、负面领域不断地被显示出来,如社会诚信问题、社会道德问题、社会控制与整合问题以及诸如社会犯罪、法轮功活动的巨大危害等等。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的问题具有自身的特点,无法简单地采用行政化的方式予以解决,更不可能引用市场化的原则和方法加以克服。因此,从根本上说,我们必须通过发育发展健全的社会来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使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社会领域突现出来,挺立起来,使人们对社会发展具有更为积极的认识和态度。

综上所述,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整体性、多层面的现代化转型,也必将体现为全面的社会化发育和重构过程,而社区发展则是社会化发育的基础性领域。一方面,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结构的历史性分化,各类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功能分化以及社会人群的利益分化,都直接促进了社区发育。另一方面,社区发育作为社会重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过程,又将成为人们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通过社区动员、社区组织、社区参与,使分散孤立的个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使不同利益、不同职业的社会人群得到新的整合,形成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和归依,促进新的社会发展。

1.3

从条状体制向块状结构转型

我们在康健社区的调查中发现,经历了十多年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居民们在社区认知和社区参与的程度方面逐步提高。据调查显示,被访者中对主要社区活动设施和场所,如居委会活动室、小区健身点、乐帮服务中心、居委会图书室、康乐文化广场、社区医疗服务点、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等社区活动场所已听说或知道的达 50%~75%,经常去和较少去的合计也达到 20%~65%。对社区开展的主要活动项目已听说或知道的也类似于上述比例。另据 2001 年在康健社区所作“社区快乐指标”问卷调查显示,每百人中报告和邻居关系和睦的人数为 83.6,每